



緒論

Craig Calhoun, Chris Rojek and Bryan Turner

就如人類社會一般，社會學也變化萬千且爭論不斷，並且持續改變它的樣貌。我們難以從單一觀點來捕捉它，或是對它下個定論。這並不代表社會學就沒有規律的模式或持久的特徵，或是沒有科學的基礎。然而，這確實意味著：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它面臨了一場特殊的挑戰。相較於物理和生物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社會或社會關係，更容易受到歷史變遷及人類抉擇的影響。相較於挑選出社會生活的特定面向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學、經濟學、地理學等範圍更窄、更專殊化的社會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範圍則更加地廣泛、複雜。正因為人類社會存在著選擇和歷史變遷，而社會生活的內在又是如此複雜，所以只要重新審視或是換個不同的角度，那麼看待事物的方式總是有可能發生一些差異。另外，即便某些社會學的發現已經相當清楚被證實了，但其不僅容易受到持不同理論的其他科學家之挑戰，而且也會受到對社會世界帶有政治或個人意見的人們之質疑。

所有這些因素都讓社會學的舉步維艱，但也更加令人興奮。同樣地，這對想為這個領域編撰出一本導論型社會學手冊的嘗試，就顯得既令人卻步但也充滿刺激。賽吉出版社(Sage)第一次出版這本重量級的《社會學手冊》(*Handbook of Sociology*)是在一九八八年，當時的社會世界與現在大相逕庭。這本前早期版本的《社會學手冊》面世時，正當騷動一九六〇年代已結束而緊跟在後的社會重整期正邁入尾聲之

際，同時也是全球性保守主義最為高漲的時刻，這從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和雷根(Ronald Reagan)同時期的執政期間即可見一斑。儘管雷根在大學確實曾主修社會學，但是做為一位總統，他的觀點和柴契爾一樣都偏離了社會的關懷，而嚮往一種個人主義的理想化。事實上，柴契爾的著名主張就是認為：不存在像社會這類的事物。藉由這句話，她想要傳達的似乎是整體社會這樣的概念中，沒有任何獨特的事物不被包含於個體成員的意志之中。雷根也同樣地聚焦於選擇的自由，這是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公民才可以享有，但在蘇維埃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民卻被拒絕給予的權利。然而，雷根對於積極的公民身分所倚賴的經濟及社會形勢，並未展現出太高的興趣。

雷根和柴契爾兩人都對全球社會的變遷做出了貢獻，尤其是對新自由主義這個關於自由市場和經濟個體主義的意識型態崛起貢獻良多。但他們也忽略了當時正在發生的一些重要事情。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的危機不只帶來了和平與自由，也同時帶來了民族主義戰爭及種族清洗行動。全球資本主義的強化不只帶來了新的繁榮——儘管這繁榮是一時的，並且僅限於這世界中的富裕國家；它也同時帶來了劇烈的後座力。美國作為世界無敵之超級強權的地位也同樣帶來了正反兩種後果，並同時匯聚於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攻擊事件中。伊斯蘭激進派份子駕駛劫持的飛機撞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象徵符號：紐約的世貿中心；撞進了美國的權力象徵：華盛頓特區的五角大廈。高科技業的泡沫幾乎在同一時間崩塌了，並使全球股市從不切實際的高點上跌下。突然間，對於全球化的焦慮和對它的熱情一樣流行了起來。當然了，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社會議題值得關注，其中包括了許多在新自由主義、高科技業及美國強權似乎明顯地佔據著優勢時被掩蓋住的議題。

這本新的社會學手冊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要反映社會生活的新現實，以及產生這個新現實並持續運作中的變遷過程，從全球化乃至於變動中的性別關係均是其著墨點。另一個目標則是要揭露縱使面對變遷卻仍持續存在的現象，我們將從都市化的長程趨勢談到深處的不平等模式。第三個目標是要表明社會學知識在方法論上及實質上的進

展，介紹至今所創造出的新知識。最後，第四個核心目標則是要對這個領域內在的多樣性做出公正的評價。社會學領域的多樣性有些來自於理論及智識觀點的差異；有些是不同研究方法下的產物，有些則是由於對不同議題的強調所造成——例如科學研究相較於家庭或通俗文化研究。當然，不同的觀點也反映出作者的社會位置和自我認同。

一九八八年的社會學手冊完全由美國人所撰寫，反映的主要是對美國社會的美國研究。史美舍(Smelser, 1988: 15)即自承「這本手冊……主要是以美國社會為基礎的社會學書籍。」而我們試著縮小這樣的偏見。儘管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學的一個主要面向，國家間在研究主題以及社會學理論形式方面仍明顯地存續著差異。在編輯這本社會學手冊的過程中，我們雖意識到全球化的增長，但也關注於反映國家間的差異。史美舍的社會學手冊是在美國高等教育界對專業化和制度化的長期論爭脈絡中集結而成。很明顯地，史美舍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回應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發表於一九五九年的一篇短文〈正視社會學做為一門專業的若干考察〉(Some remarks of confronting sociology as a profession)，同時也考慮到費瑞思(Robert E. Lee Faris, 1964)所著《當代社會學手冊》(*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一書。派深思的文章對於社會學地位的鞏固抱持著相對樂觀的態度，而費瑞思的書則納入了最重要的社會學者們傑出的貢獻。相對地，史美舍在導論中的語調則較採取防禦姿態。史美舍(Smelser, 1988: 12)指出社會學經歷了「研究專業化的漸增、研究觀點及主題的多樣化，以及許多的分裂和衝突」。此外，他也指出一系列新專門化領域的出現和成長，例如醫療、性別及年齡階層(age stratification)社會學。我們的社會學手冊承認這些由史美舍於一九八〇年代所識別出的趨勢，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就是它們已更強化了。社會學欠缺整體性的理論典範，研究的主題也持續在增長中。像是社會全球化、身體社會學、酷兒理論、風險社會學、環境社會學、動物社會學以及許許多多其他課題，都是可以提及的。再者，擁有強力且積極的專業協會之美國社會學，相較於專業發展一般而言較弱的其他國家之社會學，明顯是有清楚的區隔。關於學術專業化的利與弊，各方意見分歧。有些人主張多樣性、分裂和衝突是一門參與了

當代社會爭論議題的學科會出現的健康結果。專業化則明顯是種社會封閉的過程。相對地，人們也可以認為在專業化程度相對不振的西歐、澳洲、紐西蘭，尤其是英國的社會學，受到了以文化研究、性別研究、電影研究等等所代表的跨學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的侵蝕與稀釋。

- 3 試著縮小在史美舍的社會學手冊中明顯出現的美國偏見，並不意味要將美國排除於社會學版圖中，美國社會十分重要，美國社會學或許是這門學科中最龐大也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分支。但這確實表示我們將用更多的國際性觀點來補充美國觀點。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尚未盡善盡美，我們仍對於使用英語的社會學抱有偏袒。而社會學本身也並非盡善盡美，因為它的生產地仍不成比例地集中於北半球。然而，我們還是希望本手冊能夠顯示出二十一世紀社會學漸增的全球化特質。

壹、全球社會變遷

社會生活中恆常存在著常與變。即便是最穩定、傳統的社會秩序也會透露出變遷的模式。有的是隨著新個體的誕生或是若干家族興衰，而在一個大致一貫的整體結構中出現變遷。有的則是由於譬如瘟疫或糧荒等外部的打擊而造成，這些打擊可能會讓人口銳減，以致危及社會的存續。戰爭也可帶來同樣後果，而且還可能導致中央集權的強化，以及某些族群對其他族群的統治支配。不過，這些情況下的變遷都不屬於社會秩序內建的一部份。

與這些循環或插曲式的變遷相對的，則是更具有累聚性質的長期性變遷趨勢。數千年以來，人口成長、科技創新、早期都市化以及遠距貿易全都呈現逐步成長的模式。對於從演化角度來論述社會變遷的學者而言，從十九世紀的奠基者史賓塞(Spencer, 1985)到當代領導人物藍思基與諾倫(Lenski and Nolan, 2004)都將這些當成主要的考量因素。從這類研究中產生了兩個概化通則。第一個整體的變遷模式是社會規模和分化程度的持續增加。透過這個歷史變遷的長期模式，社會隨著經濟、通訊基礎架構及政治系統的能力升級而不斷地壯大。而隨著社

會的壯大，社會將重新細分為更複雜的次級單位配置。一開始，次級單位相對上是類似的，因為在一個社會中，家庭或是農業聚落間的差異可能不大。但是最後就會出現職業的分化，從農耕與工藝製作的區分，再到不同類型的工藝，以及初級的經濟生產者與軍事或宗教專業人員的區分，臣民與統治者的區分等，諸如此類。對於偉大的十九世紀社會學者所闡述的幾個雙叉式對比而言，這些變遷相當具有關鍵性。史賓塞曾將分化程度更高的工業社會對比於以武力為後盾的「軍事」社會(“militant” society)。涂爾幹(Durkheim, 1983)曾將更複雜的有機連帶對比於機械連帶，前者跨越分化界限而將人們聯繫起來，後者則將人們團結在相對相似的團體中。杜尼斯(Toennies, 1886)則將社區(community)對比於社團(association)，相對於已足夠較小型、簡單社會所需的共通感受及面對面關係，他更加強調組織大規模、內在分化社會所需的更抽象結構與正式組織。

第二個整體變遷的模式是，在量變帶來質變的時刻，存在著某些臨界點(tipping point)。農業即是一例，農業崛起所帶來的生產力可支撐城市及文字的文明。工業革命則是另一個例子，在每一種情況中，長期的變遷模式最終都會累積成為深遠的變革。隨著資本主義變得更加真正的全球化，且經濟活動逐漸等同於對「資訊」的控制而非物質生產，我們可以認為自己正生活於另一個這樣的量變之中(Bell, 1973; Castells, 1996; 以及本書中里昂[David Lyon]所著章節)。儘管對當代全球性社會變遷的分析方式仍存有爭論，但這些變遷的劇烈性卻毋庸置疑。

許多社會學者或許會拒絕演化理論，他們認為演化理論誇大了變遷模式在世界各地的相似性，以及趨向同樣方向的程度。他們會指出同時存在著的各式各樣歷史過程，而不願採取如適者生存這樣的單一演化機制解釋。曼(Michael Mann, 1986)主張，核心的變遷模式是由權力、國家的形成及國家能力的成長所形成之彼此橫跨的圈子，這裡的國家能力指的是維持內部平衡及處理國際間的關係兩者。提利(Tilly, 1990)至少採取了歐洲歷史的長期觀點，將資本強制權的成長以及國家能力互相連結。其他的歷史社會學者則較為強調文化或經濟性因素(藉從傅柯到馬克思等思想家的觀點)。但他們一致認為演化理論在歷史變

遷模式中建立了太多關於「進步」、關於必要性的假設，但歷史變遷會帶來善果也帶來惡果，即使結果並非總是行動者所欲，歷史變遷也會展現出目的性的人類行動的結果。的確，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三分之一期間，全球社會學的主要轉變之一就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部份是作為古典社會學的復興運動，歷史社會學以馬克思、韋伯、托克維爾(Tocqueville)以及涂爾幹做為發問之基礎，但是是站在經驗也站在理論之上回答這些提問，在大多數情況下拒絕了假定單一因果、單一方向性變遷的那些演化理論。

廣義的演化理論並不以單一因果性、單一方向性的主張為特色，達爾文(Darwin)沒有這樣的想法，許多的演化社會學家如藍世奇，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這類假設。這樣的批評倒是更適用於現代化理論，這是從一九五〇年代舉足輕重的功能論社會學所發展出的分支。現代化理論認為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條，認為發展中的社會不僅可以而且也應該追隨西歐和美國的範例來達成此目標，而這觀念不僅在社會學領域，在整個社會科學界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例如 Inkeles and Smith, 1974; Parsons, 1977)。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晚期，這條路徑受到了挑戰，挑戰不僅來自於社會學研究，同時也來自它所鼓勵的開發方式之明顯問題。依賴理論揭露了在經濟發展方面較早居領導地位者獨攬權力、不讓其他國家(包括它們過去的殖民地)分一杯羹的程度(Cardoso and Faletto, 1978; Frank, 1980)。世界體系理論則表明國家在全球結構中位置的重要性，位置形塑了開放的選項，影響任何國家經濟發展的機會(Wallerstein, 1974, 1988)。

儘管單向性、帶有西方偏見的現代化理論顯示出如此嚴重的缺陷，但學者間仍存在著一個廣泛的共識—邁向現代性的轉變乃是世界史長河中最重要的大規模質變之一。這涉及了多個不同的因素，資本主義以及／或者市場、國家的形成和科學是其中不能不提的三個。其他因素則包括世俗化、國族建立(nation-building)、前瞻性社會運動以及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不同理論會著重上述三個因素和這些其他因素的不同結合。現代時期的不同模式於是被提出，例如共產國家沒有市場經濟卻形成了強有力的國家；同時其他國家並未透過世俗化的方

式來限制宗教，藉以現代化其國家的政府和經濟。更近年來，許多社會學者主張不應再談論單一的現代化，而應該要承認「多樣的」、「另類的」現代性(Eisenstadt and Schlacter, 1998; Gaonkar, 2001)。

這些不同的理論，全都無法削弱邁向現代性之重要性，只是讓現代性的意義圖像變得更為複雜而已。當代理論學者不願採用一個不同的社會多少可在其中找到相似性的理想模型，他們看見的是一系列不同形式的現代社會彼此共存。而現代性不僅是每個社會(或其成員的文化或性格)所擁有的一項特徵，也是屬於整個時代的特徵。即便不同社會產生出不同形式的現代性，那麼，什麼又是這個時代的共通點呢？有四項轉變是關鍵的：

1. 互連活動(interconnection)的規模與強度逐漸增加，針對這現象，全球化是最共通的簡單表達。某地發生的事件可以空前迅速地引發全球性的迴響，正如二〇一一年的一九一一事件，以及較早的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所揭示的。
2. 個體從封閉的地方社群以及傳統、面對面關係的文化中逐漸「脫域」(disembedding)，這過程是透過大規模社會中的媒體、教育、移民、經濟抉擇以及公民身分而實現。
3. 有效權力(effective power)的集中化；但權力未必如過去般掌握在君主及帝王等個人之手，而是集中在強而有力的科層機構及社會菁英身上。儘管一個中世紀的君主可以下令殺死一名屬下，但如果這名倒楣的家臣剛好不在眼前，即便只是一個小小的王國也要花上幾個禮拜的時間才可以將命令送到偏遠地區。今天只有少數統治者可以動不動嚷著「砍掉她的頭」，但國家的監視能力及有效行動卻可有效率地傳遍整個國家，進入個人的生活及家庭內——不論這樣是好是壞；影響力可從稅務徵收、強制入學，乃至要求接種疫苗或是迫害宗教少數團體。
4. 自我維繫的變遷過程。現代性最顯著的單一特質，或許是它同時擁抱了發展的概念以及一組制度化、組織化的特質，而後者促成了持續且通常是劇烈的社會變遷。舉例而言，資本主義競

爭意味著商業活動必須不斷推陳出新，否則就會喪失市場優勢而輸給其他公司。科學活動不僅持續增長知識，對技術也有所助益；它不但解決了發明家腦中的問題，同時也使得一系列新的活動有了實現的可能(且經常創造出新難題)。關於自由、平等的公民身分的概念促使對生活風格、性傾向、族群及社會運動等多樣性平等認可的主張，而在更早的時代它們可能是受到壓迫的。如果現代性是關乎一件事，那麼它指的就是最新的事物，是將變化當成美德、當成進步，當成成長以及奮力向前邁進的觀點。

現代化理論的一個古怪特質就是它傾向將歐洲強權的前殖民地只當成在公平的賽場上競爭的獨立社會，而非以殖民統治為基礎且建構中的社會；而這些社會不僅需要處理國內殖民地化的牽連，同時也必須面對持續擁有國際強權的前殖民統治者。舉些直率的例子，牙買加人和印度人並不是因為湊巧喜歡上英國這個前殖民強權才移民過去，而是因為英國一直相對富裕，而且可提供各式各樣的經濟機會。

由於現代化理論所受到的批評，也由於在一個共通的全球秩序下不同類型社會的互連程度持續增加，了解現代性的特質於是成為社會學議程中引人注目的新議題。但現代性不僅只被視為一個所有社會都想追求的目標，它反而受到了批判性的審視。例如鮑曼(Zygmunt Bauman, 1991)就曾明顯指出，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只有在現代性中才可能發生，也因為現代性才得以實現。儘管在歷史各時代中，統治者均行使著無情而殘酷的權力，但極權主義的思想及其不僅要支配還要控制、甚至是改變個體存在狀態的野心，則明顯地是屬於現代的。而現代性和全球化過程的各種黑暗面仍持續讓人感到憂慮：好比愛滋病及其他傳染病的流行；以科學為基礎發展出致命程度不斷加劇的武器，並透過非法但仍然十分活躍的資本主義市場行銷全球；以及新電子技術的監控能力對於個人隱私的威脅。

令人驚訝地，當舊版《社會學手冊》問世時，這些議題中僅有極少數已成為明顯問題(Smelser, 1988)。已經浮上檯面、且可期待被納入

書中探討的只有少數幾個。但儘管《社會學手冊》對「社會學重心為何？」這問題創造出屬於自身具高度爭論性的觀點，這議題不只關乎編輯的選擇，也和所展開的劇烈社會變化有關；其中許多社會巨變是在一九八九年這具有象徵性意義的知名年度中發生^①。

在問到社會學自身如何轉變之前，或許值得逐一指明形塑社會學的當前脈絡，而社會學儘管只是提綱挈領式地說明，但也回應了近期全球性的社會變遷。下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些社會變遷(若不是在過去十五年中發生，至少也佔據中心位置)。

1. 蘇聯垮臺及冷戰終結。這引發了後續一系列其他的變遷，包括從前南斯拉夫、中亞到非洲部份地區的一連串的內戰及民族主義動亂、隨著前共產主義社會成員加入所造成的歐盟的擴張。在前蘇聯內部，個人生活、宗教以及商業活動方面都獲得了新的自由，卻也危機四伏。隨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SSR)分裂為多個全新的獨立民族國家，創造出動盪不安的邊界以及不快樂的弱勢族群。過去國家部門裡的技術勞工湧入西方尋求報酬更佳的工作，於是出現人才外流的棘手現象。蘇俄及許多其他國家的醫療體系大幅度崩解。國營產業透過貪污交易被賤價私有化，這創造出一個極端富有的新階級，卻對一般勞工沒什麼好處。於是有些人變成了右翼的民族主義份子，有些人懷念起共產主義。不過，儘管蘇俄及中亞仍深陷危機，卻有部份東歐地區較成功地完成了市場經濟和民主的轉型。
2. 美國作為全球強權的優越地位儘管在實力上沒有可匹敵的對手，但卻不能免於挑戰。有些人稱它為美帝，有些人叫它做新全球霸權，或有人稱之單極世界(unipolar world)，儘管眾說紛紜，但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權力高峰則是人們之間普遍存在的共識。而且至少在小布希(George W. Bush)任

^①：儘管這位編者宣稱他的意圖不是要建立一個社會學「正典」，但這本《社會學手冊》的確被廣泛認為提供了關於這門學科的「正統」敘述。關於這主題的評論文集，參見 Calhoun and Land, 1989.

內，美國已打算要繞過聯合國和其他多邊性組織及夥伴關係，單方面地施展這股勢力。美國曾兩次入侵伊拉克，而第二次入侵發生在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間，更是不顧其長期盟邦的反對。美國的支配地位使其成為恐怖攻擊的箭靶，最有名的一次就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俗稱「九一一」)的攻擊事件。但恐怖份子也攻擊西班牙和支持美國的其他國家。

3. 全球化程度加劇。整體世界的互連程度在各方面都更為明顯可見，金錢、人、資訊甚至是疾病的流動都更增強了。這同時也代表了具有全球性規模的國際市場、生產組織以及企業的成熟、新溝通技術的可得性、跨國組織的發展以及英語作為世界共通語言的擴散普及。金融工具市場，「衍生性金融商品」(包含「避險基金」)的大型全球市場也包括在內，這兩者共同刺激了投機買賣，並削弱了個別國家的財政自主性。隨著國際金融市場力圖預先掌握貨幣幣值及其他金融事件的變動，風險管理成為一門極大的生意。當不太有錢的人對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或是其他大災難感到憂慮時，他們就會出現風險分攤的意識。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紀初，人們目睹了一波緊急事件及人道主義危機，同時也看見全球性非政府組織及慈善機構為因應這波危機而急遽擴張。民族主義鬥爭、種族清洗事件、內戰及集體屠殺的發生均製造了大量的難民潮。人道組織如無國界醫師(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的角色也變得愈來愈突出。
4. 大眾傳播媒體的急遽擴張讓全世界在同一時間親眼目睹一九八九年以降的多齣事件。如果說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屠殺以及柏林圍牆的倒塌可以印證這樣的說法，那麼南斯拉夫(Yugoslavia)和盧安達(Rwanda)的種族清洗恐怖事件、美國的兩次入侵伊拉克也幾乎符合同一描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成了全球資訊來源，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BC)也不遑多讓，還有天空新聞(SkyNews)以及其他西方所控制的媒體相繼加入。但這些媒體霸權最終還是受到半島電視台(Al-Jazeera)的挑戰。儘管對資訊的進用能力是不平等的，但資訊的全球化程度日增卻是事實。印

度「寶萊塢」(Bollywood)的電影幾乎就像好萊塢影片一樣地廣泛流通著。拉丁美洲的戲劇節目(telenovellas)在中國被熱烈收看。在中東和非洲流行著埃及的肥皂劇。世界音樂雖已成為西方世界中廣受歡迎的一種流行品味類型，但事實上許多音樂風格都有來自全球樂迷的支持。網際網路刺激了文化消費的全球化。從運動、疾病到政治立場，基於共同興趣而建立的虛擬社群加入了網際網路聊天室。在網際網路最廣受歡迎的貢獻中，色情的氾濫流竄是許多傳統主義者最擔心的；網際網路有助於政治異議份子的組織集結，則讓許多政府憂慮不已。傳播技術持續推陳出新，手機不僅大幅普及，更結合可傳遞文字訊息的電腦功能。

5. 人口區劃(demographic division)現象被先進工業社會的高齡化與低度開發社會的相對年輕化最為清楚地描繪出來。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照護需求，世界上較富裕國家的「銀髮化」已經成為一個主要課題。這也造成了移民，例如人口高齡化的歐洲引進勞動力應付其服務業需求，以及經濟區劃(economic division)現象。有能力負擔照護支出的人通常在種族、族群、國族方面有別於照護提供者。人口區劃也有助於維持國際性的經濟不平等，並因而阻礙經濟成長。隨著愛滋病成為全球性的傳染病，此一現象又更形複雜化。由於愛滋病對於女性人口造成的殺傷力愈益增加，進一步地改變了性別的結構；而許多國家重男輕女地篩選嬰兒性別(產前或產後)也大幅地改變了兩性的比例。
6. 西方福利國家面臨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後者同時指涉了聚焦於削減津貼與減少對相對富有社群的依賴的國內意識型態，及以推動「自由市場」和削弱政府角色做為較貧窮社會通向經濟發展的手段之國際的意識型態。對許多人而言，新自由主義似乎是透過全球性市場壓力強加於其他國家的美國〔或是盎格魯－美利堅(Anglo-American)〕模式。勞工們經常被告知除了接受較低工資、較少的津貼給付或犧牲工作穩定性之外，他

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防止工作被轉移到較低度開發國家的唯一辦法。無論是私人的退休基金或是政府的社會安全體系在財政方面都遭到了挑戰，也有許多崩潰的例子。醫療體系變得越形所費不貲，在許多國家，所提供的照護服務以及付費者的結構也已改變。教育的逐步私有化翻轉了國家對於平等受教權之擴大支持的長期趨勢。

7. 全球及國內勞動力市場之劇變。穩定的、有時是終身僱傭制的舊有工作模式開始瓦解，即便是在終身僱傭制成熟至許多人甚至把它視為一種權利的日本，也難逃這股趨勢。增加生產力的技術降低了對某類勞動力的需求，國際性的經濟競爭迫使企業必須想辦法減少成本，而在許多產業中，併購風潮則造成了企業的合併及工作機會減少。「工作委外」(outsourcing)現象讓富裕國家中的一些工作機會被移往中度開發國家，設在愛爾蘭和印度的客服公司，為總部位於美國的企業回答來自世界各國客戶的詢問，就是一個例子。勞動力的散工化(casualization)意味著勞動者必須時常變換工作，而且常在每一次轉換時蒙受損失。
8. 引人注目的新技術雖刺激了經濟成長，同時也帶來擴張與收縮交替的景氣循環。這些新技術也改變了日復一日的生活，資訊和生物科技是最明顯的例子。電腦不僅成為幾乎每個書桌上的必備品，而且還變得可隨身攜帶、聽音樂、播放影片，這促進了電腦消費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幾乎生活在世界上較富裕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大量的個人資料被記錄在電腦中，並因此引發了對於隱私權與監視的關注。在此同時，生物科技創造出大量的基因改良作物，這現象投合了某些人的熱衷同時也喚起了其他人的恐懼(恐懼其對人類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對環境的潛在傷害)。延長人類壽命、強化性能力、控制情緒的新藥物面世，卻也引發了深層的倫理關切。
- 8 9. 社會運動活力逐步增強至超越一九六〇年代、一九七〇年代，對公司行號及政府形成挑戰，並將注意力集中於各式各樣的議題。在一些例子中，例如墮胎權的爭議上，正反雙方都有積極

強力的動員。但在其他情況中，比方說針對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普遍反對，行動主義(activism)是那些在公司董事會及菁英政府圈中沒有代表人的人們所採取的策略。以反企業支配的全球化為目標的社會運動，集結了環保人士、原住民請願者、憂心中央集權的無政府主義者、擔憂國家喪失主權的公民，以及正面臨得來不易的勞工權利逐漸喪失的勞工團體。社會運動也要求對愛滋病做出更好的回應、男女同性戀者的平等認可、少數族群權利的保障、對傷殘者的給養。

10. 宗教在公領域中的復甦。儘管早先的社會學經常認為世俗化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常態，但是宗教的勢力並非恆處於退潮之中，則是日益明顯的事實。美國長期以來維持著高比率的宗教參與，近年我們更看見基本教義派教堂激增，而在福音派教會的新教徒以及政治上採取保守立場的天主教徒，其宗教活動都有大幅成長。大多數西歐國家人們上教堂的比例較低，但在歐盟的新舊成員之間，宗教承諾已成為重要的緊張局勢。然而在非洲、亞洲以及拉丁美洲，基督教信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成長，而無論在神學議題、生活風格如同性戀者人權的問題上，新的基督教社群經常比舊社群更加保守。在這同時，外來移民也改變了已開發世界的宗教風貌。和基督教及猶太教信仰一樣，佛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現在也屬於美國宗教的一部份了。即使在宗教已大幅度世俗化卻仍自認為基督教的許多歐洲國家中，大量的伊斯蘭教少數族群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在這些地方，世俗傳統因少數族群渴望得到公開的宗教認同而受到挑戰(例如法國政府禁止穆斯林女學童戴頭巾到校)。而伊斯蘭教自身也成為一個世界性宗教，日益增加的通訊之流將中東的穆斯林和南亞、東南亞、前蘇聯、歐洲、美國及非洲的穆斯林連結起來。儘管經常被貼上反現代的污名化標籤，但更妥當的做法是將伊斯蘭教視為是正在尋求面對現代性方式的人群中的復甦宗教。對印度教也應採取同樣立場，在印度人之間，它逐漸組織化並成為既是宗教也是政治性的一股力量。

貳、全球社會學轉型

世界在變，社會學從未置身其外。相反地，過去十五年來，我們看見社會學對早期的社會變遷提出了令人振奮的新觀點，也看見方法和理論上的重要進展。但社會學也同樣地持續參與著周遭的社會世界。在某種意義上，一九八〇年代末可說是社會學的低潮期，社會學遠離了一九六〇年代所懷抱的熱情，也確實遭遇到某些後座力的震盪；後冷戰的世界也尚未成為其學術重心。但在過去短短幾年來，社會學已經得到了驚人的復興，這反映在學科的智識激盪與新學生的人數上。從下列簡單例子可見一斑，二〇〇四年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年會吸引了空前人潮，創下自這類會議舉辦以來的記錄。國際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也經驗到同樣的復甦現象。理由很簡單明瞭：社會學的重要性就在於去了解今天的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

那麼自從舊版《社會學手冊》問世以來，社會學發生了什麼巨大的改變呢？顯而易見的是，每個社會學的次領域中都出現了科學性的進展。然而，我們的清單只打算將重心放在那些影響到學科整體的次領域。下面就是這本新《社會學手冊》的章節中所欲概略描述的主題，儘管它們也同時提供讀者對特定次領域發展的最新资讯。

1. 全球化作為課題與關注焦點(engagement)。嘗試廣泛地瞭解全球化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學者的核心關注了。這條路上的先鋒之一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曾與凱瑟琳(Kathleen)合力撰文，探討全球化模式及其如何改變社會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但全球化議題也以其他姿態現身。全球化是比較社會學復興的重要原因，艾伯特(David Apter)即曾針對此一主題進行討論。它也是社會學對貨幣和金融分析的重要性日增的關鍵因素，正如殷漢(Geoffrey Ingham)所揭示。克雷格(Stewart Clegg)分析了商業全球

化；彼埃特思(Jan Pieterse)探討全球性不平等的結構；馬里瑟維奇(Siniša Malešević)和霍爾(John Hall)則研究全球化時代公民身分及民族國家的方向與進展。全球化也是傳播〔席佛史東(Roger Silverstone)的討論〕、資訊〔里昂(David Lyon)的討論〕、健康和疾病〔阿爾布雷希特(Gary Albrecht)的討論〕、人口統計學〔賀須曼(Charles Hirschman)的討論〕以及高等教育〔德蘭遜(Gerard Delanty)的討論〕等課題的一個重要面向。

2. 「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近年來社會學所發生的最戲劇性變化之一，就是文化作為一個社會學關注的課題，又重新得到了重視。這包括「文化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以文化取徑來探討所有的社會學課題)以及「文化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culture，代表專研文化生產，對象特別是包括藝術、音樂、文學及電影在內)。葛立斯伍德(Wendy Griswood)曾經在這兩種意義上針對文化進行探討。然而就像全球化一樣，文化是形塑整個學科研究風貌的一項主題。這是我們從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對於「工作的文化」之說明、透納(Bryan Turner)對於宗教社會學的分析、賽蒂納(Knorr Cetina)對科學與技術的檢視，以及史萊特(Don Slater)論消費及生活風格、羅傑克(Chris Rojek)論休閒和娛樂的篇章中均明顯可見的。
3. 經濟社會學。如果說有另一個社會學次領域出現如同文化社會學般的戲劇性成長，並且在對學科整體的貢獻上可以和文化社會學相較的話，那就是經濟社會學了。它的根基主要是組織社會學，但它已經成為社會學中最具影響力的部份之一，同時也是商學院以及社會學系中重要的領域。殷漢、克雷格、史萊特以及桑內特都曾進行過經濟社會學面向的探討。但是經濟社會學觀點在其他領域中也是值得矚目的，這在塞森(Saskia Sassen)論都市的篇章、沙維奇(Mike Savage)論階層與權力以及康利(Dalton Conley)論貧窮的例子中均顯而易見。
4. 認同。全球社會在近年來進入動盪不安的時代，而過去被認為相對固定的種族、性別、性慾特質、族群及國籍等認同的不穩

定化現象，即是屬於這個時代的特色之一。爭取改變及認同已成為社會運動與各種宣傳活動的重點。而這樣的變化也改變了社會學研究的性質。對於性別認同的檢視補充了對兩性不平等以及性別角色的研究；性別廣泛地作為社會學的核心範疇(而非僅是一個特殊的課題)，也已實實在在地獲得了認可。這正是華爾比(Sylvia Walby)所撰章節中最核心的焦點，而也是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的重要主題，後者揭示了性別和族群如何產生相互關連；而對於從家庭社會學角度來思考變遷的透納以及檢視身體這個社會學新領域之發展的克羅斯利(Nick Crossley)而言，性別也同樣重要。性別議題顯然也與性慾特質(sexuality)重疊，這點在普洛賓(Elsbeth Probyn)所著章節中有所著墨。性別、種族、族群以及性慾特質，這些認同均形成消費及生活風格的模式(史萊特對此進行了分析)，塑造了健康和疾病議題(阿爾布雷希特討論了這些議題)，形塑了偏差以及社會排除的運作方式〔正如施泰納特(Heinz Steinert)所揭示〕，並確確實實地具現在一系列的領域中。

5. 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的復興。社會學對於公共事務始終有自己的一套觀點，社會學研究不僅塑造了政府的決策過程，也影響公民之間的論辯。然而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有一種「純科學」的觀點，主張為了其他社會學者生產的社會學才是最恰當的，社會學的角色因此被極小化，或僅被視作將社會學引進更廣大公共論辯中的通俗化嘗試。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早期，這樣的觀點受到了挑戰，人們呼籲將研究和教學的重心放在更具「關聯性」的議題上，但在過去幾年中，這樣的觀點也再次受到了挑戰。在美國，「純科學」的意識型態或許比大多數其他國家都更加強大，但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卻運用他在二〇〇四年擔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的任期間大力推動「公共社會學」。在歐洲也明顯地出現了同樣的趨勢，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最後的餘年中將重心放在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現象；如杜罕(Alain Touraine)不間斷地進行

和社會運動與公民身分相關之行動研究；也正如卡格爾茨基(Boris Kagarlitsky)努力活化在後蘇聯的俄國社會中的公共論述。紀登斯不僅寫了《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並協助打造英國新工黨政府(New Labour)的政策，他也幫助倫敦大學政經學院重新成為積極投入公共參與的科學機構。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這位最著名的公領域理論學者，終其一生以社會學者的角色對社會發揮了顯著的影響力，並在最近這些年來對歐洲整合議題持續發表關鍵性的看法。在全世界，對「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日益關注確實已使得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愈見凸顯。而幾乎在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之中，讀者們都可以找到與公共論辯相關的社會學知識，並同時發現社會學自身如何受到公共議題參與過程的形塑。

這些社會學的轉型都具有基礎的重要性。每個社會學的轉變都是建立在這門學科長期以來的實力上，都更新了部份的社會學傳統，也都代表社會學為增進對社會及社會變遷的認識而持續投入的科學性努力。因此，在這本《社會學手冊》的第一部份，先考慮某些理論和方法的基本發展中所出現的一些新方向會是個適當的做法。我們不打算把所有可取得的材料通通審視一遍，如果我們這樣作，就會產生一本全然不同(而且厚多了)的書了。我們反而要求作者們把焦點放在主要的變遷，以及對近年來研究工作起形塑作用，並成為當前新研究基礎的議題。雷夫特利(Adrian Raftery)分析社會學研究中的量化方法所出現的成長與轉變。艾金森(Paul Atkinson)和德拉蒙特(Sara Delamont)則把重心放在質性研究傳統上。在質性和量化兩種情況中，作者們都指出技術之外還有更多重要的東西；方法只是將智識的探索加以組織的工具。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檢視社會學與哲學的關係；哲學是社會學理論的基礎，針對社會學對成為一門科學的意涵為何的反思性自我理解，哲學也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克羅德斯(Charles Crothers)說明了社會學傳統的多元性，也同時指出我們還需要更多努力以克服偏狹性，才可以獲得各種學術領域所提供的益處。艾伯特重新審視比較社會學的

復甦現象；在全球化世代，比較社會學尤其具有重要性。

有時候，想要成功推動各式各樣實踐方案的欲望會讓人產生幻覺，以為改變社會世界比實際上來得容易。就像革命者如果可以說服人們革命的風險不高，他們就可以找到更多的追隨者一樣。相對地，那些推動保留傳統價值的人想要找到更多的支持者，只要成功地讓人相信傳統只會因個人選擇的脫軌行為而受到削弱，跟資本主義經濟尋找新產品、新市場的動力、與它讓人們產生新需求的廣告技術完全無關就行。從最一般的情況來說，人類對於他們生存於其中的社會狀態是具有某些選擇能力的，而且人們在現代社會中確實比歷史上大多數時間裡擁有更多的選擇；人們的主觀意願更常讓他們被導向個體主義意識型態的方向，而低估了社會的力量。但至少社會學持續提醒人們，個人選擇的抽象自由不同於讓自己的選擇產生實際效果的具體能力。個人較容易選擇在一場選舉中要把票投給哪位候選人，但是較難選擇要在什麼樣的政治體系下生活。後者受到法律、移民管制、經濟資源、其他人的互助協力以及權力關係的控制。人們可以讓政治體系出現改變，但是通常必須透過社會過程才能達成，而且只有在其他社會生活面向的變化能夠增強它時，改變才能成功。

但在其他時候，社會變遷的速度又容易讓人們覺得社會生活很不穩定，甚至全然不可預測。這也同樣是幻覺。即便社會生活的許多特質出現了劇烈的改變，但其它東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不變的。舉例而言，在過去的二十年來，我們看見了前蘇聯的瓦解及冷戰的終結、資訊科技帶來的戲劇性變化，以及造成許多國家的文化愈益多元化的大規模國際移民現象。社會學的部份任務就是要了解這些具有歷史特殊性的轉型(而本書的內容確實有助於完成這項任務)。不過，正如我們需要清楚知道什麼改變了一樣，我們也必須承認許多事情仍舊維持原樣。政治強權間的衝突和競爭關係雖已重新洗牌，但仍然是全球事務的基本主題。資本主義企業的權力仍然甚至比某些國家都更為強大，共產主義的垮臺只是讓這件事在某些時候顯得更真實而已。對資訊的控制仍然是權力的一個基礎來源。移民始終是社會緊張及文化創造力的來源，儘管少數族群的地位逐漸凸顯，但仍持續受到偏見的挑戰，

也持續從被理解得到支援。

總言之，就像過去一樣，今日，人們仍舊需要社會學來理解抉擇和改變的可能性、理解那些持續再生產出既存結構的壓力。社會學正在復興當中，當它奮起面對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時，社會學也再次得到了活化。這本《社會學手冊》針對廣泛的一系列主題提供了介紹，內容包羅了理論、研究方法及經驗性的議題。它們並不是這門學科的全貌，卻讓人想要以更近的距離去觀賞。

參考書目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auman, Zygmunt (1991) *The Holocaust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alhoun, Craig and Land, Kenneth (eds) (1989) 'Smelser's *Handbook* an assessment', *Contemporary Sociology*, 8 (4): 475-501.
- Cardoso, Fernando H. and Faletto, Enzo (1978)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Durkheim, Emile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isenstadt, Shmuel and Schlacter, Wolfgang (1998) 'Introduction: Paths to early modernities -a comparative view *Daedalus*, 127 (3: 'Early Modernities'): 1-18.
- Faris, Robert E. Lee (ed.) (1964) *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Frank, Andre Gunder (1980)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Gaonkar, Dilip (2001)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Inkeles, Alex and Smith, David (1974)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nski, Gerhard and Nolan, Patrick (2004) *Human Societies*. Herndon, VA: Paradigm Publishers.
-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59) 'Some remarks confronting sociology as a profes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547-559.
- Parsons, Talcott (1977)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melser, Neil (ed.) (1988)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Spencer, Herbert (1885)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Greenwood.
- Tilly, Charle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Toennies, Ferdinand (1886)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1988)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s 1 and 2. La Jolla, CA: Academic Books.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與未來正式上市版本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在正式上市時能即時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